

清代江西商人的漆器经营

吴俊 寇焱

【摘要】清代漆器的制作与生产较之元明时期更为繁盛，以官办手工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已逐渐为民营手工业所取代。从百姓日常之用度、朝廷御贡之品玩以及外销于欧洲诸国的贸易品来看，漆器的需求量是十分巨大的。但与同时期的大宗商品如瓷、丝、茶、粮、盐等相比，漆器业往往又容易让人忽略，其贩运路途之长而广、经营手段之繁而杂，多是由江右商人进行统筹与协调，最终保障了各地漆器的商品流通。

【关键词】漆器；江西商人；贸易线路；经营方式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9)05-0169-07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清代以来江西漆器外销研究”（15YS01）

吴俊，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

寇焱，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通讯作者）。（江西南昌 330013）

清代漆器业在较为宽松的工商业政策之下，手工艺品与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各地的民间漆艺作坊兴起，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崭新局面。^{[1](P15)}究其原因，除了其自身工艺发展规律外，漆器商品市场的扩大及流通网络的形成也是重要的客观条件。明清之际作为重要商帮之一的江右商人，以当时发达的大宗商品为依托，小贩小卖地进行财富的积累，却对当时社会经济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2](P11)}他们的经营方式及特点极利于漆器等小宗工艺制品的贩负经销，又能够凭借便利的地理优势，依托各大集散重镇，进行全国各个地区包括江西本土漆器的集中和分销。

一、清代漆器贸易状况及江西商人的优势地位

中国两汉时期的漆器对外贸易主要以官方的朝贡往来居多，基本限于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物产或技术的交流，但随着陆上丝路的逐渐衰落，海上丝路的崛起与繁荣，宋元时期漆器的商品化程度不断增加，贸易介入文化生产的功能已十分显著。到了明清时期，民间私人贸易活动已十分频繁，新航路的开辟与航海学的进步，均为中国漆器的输出提供了绝佳条件，尤其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郑氏请降伊始，清朝廷设粤海关并打开海禁，不仅提高了商品经济效益，还通过各种海外贸易推动了漆器文化的外溢。除传统东亚、南洋航线之外，还开通了欧美海上航线，江浙、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省份的各大港口均有漆器的对外销售与出口，海上漆器贸易数量庞大，需要足够的漆器生产原料和各类胎型的供给。江西作为与上述沿海诸省全部连通的唯一内陆省份，水运、陆运交通都较为便利，江西商人源源不断地将材料进行集中和贩运，以保障外销漆器按时按量地产出，又将精致的漆器运回内陆兜售，形成了漆器订制、加工、外销的中转枢纽。

清代漆器的国内贸易属于小宗商品的买卖，很难受到各大商帮的重视，而江西商人则对漆器及其原料的贩运与经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商品经济尤其是手工艺品发展的均衡性。一方面，清代江西漆树种植量大，生漆资源相对丰富，为本土及周边地区的漆器制作提供了重要的原料。另一方面，江西与漆艺发达的各省份为邻，省内江河交织，并形成了成熟的漆器与生漆集散重镇，如河口、樟树、上高、赣州、吴城、南昌、九江等，有利于商人对漆器的集中和分散销售。因此，就国内漆器贸易的格局而言，江西商人的地位和作用十分特殊。

随着清代江西漆器生产和销售规模的扩大,逐渐形成了商人与匠人间的雇佣关系,漆匠、漆商共同繁荣了江西漆器的对外输出。康熙中后期江西、浙江率先将匠班银摊入地亩,工匠获得出卖劳动力和技艺的自由,漆商则利用手中资本,由流通领域渗入生产领域,支配坊户业主和生产工人,或者直接充当坊主,雇工生产。如百年传承的宜春漆手工艺作坊至少二十余家,出售成品的漆器店铺,可查的也有邹华通、易荣泰、邹和圣、陈洪盛等十几家,其中既有家庭式作坊自设营销点,也有商铺对匠人的雇佣行为。待遇的提高和从业人数的增多,使漆器制作的分工越来越细,在保证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提高了工艺水准,有利于江西商人对市场的把控与本土销路的拓展。

除此之外,清代江西漆器工艺发展极富特色,以鄱阳、宜春、庐陵三个地区为代表,把江西文章锦绣之气和商人的博雅好儒之风传递得淋漓尽致。鄱阳漆器业的商人与匠人,以家庭为单位,自产自销脱胎漆器,其精湛的刻漆工艺和仿窑变、隐花的特色十分鲜明,两对黑退光脱胎漆器帽筒在1915年的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曾艳惊四座,名扬海外。宜春地区商贾纵横、艺人云集,其脱胎漆器包括盘、盒、花瓶、帽筒、带耳盖碗等,皆工艺精细、轻巧玲珑、色泽光艳,漆匠们除了传统器皿以外还生产多种花样的洋式烟盒、茶叶盒、花瓶之类的工艺产品,远销各地,文人们的参与创作,使得宜春漆器脱离匠气之感,极富雅意,其布胎和摆锡的工艺特色在光绪年间曾获南洋劝业会银奖。庐陵则从元代起就是髹漆官办四大作坊之一,当地螺钿漆器,工序严谨,图饰层次递进,其气韵古雅、章法分明的特点一方面影响了清代宫廷漆器的审美,另一方面在外销东洋之后对日本的漆器工艺影响很大。

综上所述,相较于同时期其他地区的商人,江西商人在全国的漆器贸易中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其一,江西作为漆原料和漆成品的重要产地,手工业及商品经济发达,商人依托几个重要集散地进行分销,足以保障对周边省市地区的漆器供给。其二,省内从事漆业人数众多,包括大量的商人和匠人,本土漆器极具地域特色,无论从工艺质量还是装饰手法上来说,都得到了统治阶级、市民阶层及收藏者的认同。其三,江西是近海的中部省份,水路四通八达,地理区位优势,商路网络繁荣,是江西商人长途贩运的有利条件。其四,江西商人不以利薄而热衷于经营小宗商品买卖,尤其是同时期其他商帮忽视的漆器等手工艺制品的贩运与经营,从商者大多以诚信为贵且义利并重,为漆器经营提供了关键的人为前提。

二、江西商人的漆器销售路线

清代江西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北贾汝宛徐邳汾鄂,东贾韶西夏夔巫,西南贾滇黔黔沔,南贾苍梧桂林梧州。”^[3](《楚游诗序》)随着江西商人水陆并行地开拓出数条商路,漆器贸易也与全国各区域市场紧密联系起来。

(一)以广信府为中心辐射苏、浙、闽地区

信江流域地接苏、浙、闽三省,襟浙带闽而成为江西东北部的门户:“信河西接鄱湖,南通吉赣,货船往来如织。”^[4](卷二《地理·疆域》, P35)商人从南昌出发,经余干、贵溪、弋阳、广信、玉山,进入浙江衢州常山县,再走驿路可抵达杭州,商人们就地分销带来的货物,其中漆器、瓷器是杭州居民争购的畅销品。^[5](P222)与江苏各府县的贸易则通过河运把货物汇集于鄱阳湖,从湖口入长江,至扬州、苏州等地。清中期以后,在苏州经营漆业的商人大多来自江西。乾隆时宫廷画家徐扬所作《盛世滋生图》中就描绘了五家苏州漆器铺。嘉庆元年(1796),苏州重建江西会馆,各行业捐银资助,其中丰城漆商捐银三十二两。道光十七年(1837),漆业向善公所捐款用以修葺、祭祀等,人数多达五百^[6](P64)。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前,在苏州经营漆器的江西商人规模不断递增。

与福建的漆器贸易往来主要依靠陆路,商人从广信府出发,经铅山县,过分水关进入福建崇安县,下闽江到福州。铅山县在雍正时便已是八省通衢的商埠重镇:“江浙之土物由此以入闽,海滨之天产由此以达越。”^[7](卷一三五, P779)江西商人在其间的周转作用不可或缺。第二条路线是由广信府往南,走广丰县,过二渡关,抵达福建建宁浦城县。第三条则是由贵溪往南,直达福建邵武光泽县。

除府城、县城外,环绕信江流域的河口镇、沙溪镇、瑞洪镇等皆是人烟稠密、商民千余的商业重镇,如百货齐聚的河口镇,漆器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由江西商人与外省商人共同经营。嘉庆二年士商共建南昌会馆于河口镇三堡^[8](P116),此会馆经营即以瓷器、漆器、竹、纸为主。在这里,江西商人将自鄱阳而来的本土漆器贩运至常山、闽西,又把广东来的漆器往西运至吴城^[9](卷一《志书五·食货书·聚化》, P53),

交由徽商转销,还有一部分则是伴随着其他土特产品、奢侈品,由本地商人直接转销给滞留此地采办的外省商人和官僚,促成了高层消费的流通。

(二)以赣州府为中心对接广东地区

清代的赣州关既掌控章、贡两水及广东水系的往来船只,又坐拥大庾岭商道的咽喉之势,生漆与漆器是经由赣关输出的重要商品。许多省份的商货抵达这里,由商人越山南运,或从另一侧越过山岭,运往相反方向。广东进口的舶来货物,也经由同一条商道输往内地。广州到韶州的货运,经珠江、北江,到韶州后再转浈江往南雄县城,都是水路,从梅关过了大庾岭,沿着漳水到虔州,再经赣江到达鄱阳,再走淮河、汴河等水路到中原各地城市,形成鄱阳湖——赣江——大庾岭——广州——岭南的主要商道。除大庾岭之外,还有大坊——信丰、南亩——虔南两条支路,在这里,江西商人往广东贩运的漆器及生漆原料主要来自本省和福建、浙江,而广东的特色漆器则由江西商人按原路捎回运至省外,目的地是以四川为主的西南地区。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重新推行闭关政策,关闭了苏、浙、闽三地海关,仅留下粤海关一口通商,自此,广东向外输出的漆器一枝独秀,并主要以漆家具的对外销售与出口为主。18世纪英国人将大量家具加工后,运到中国广州上漆制成漆家具,但此种运输再加工的方式成本过高,引起各方面反对和抨击^{[10] (P28-30)},加上其他各方面因素,当时广州漆器质量相对较差,因此改由英国订制^{[11] (P167)},内陆做成品,广州加工描金。江西商人所扮演的角色则是采买转运,把各地的漆器成品和大量原料运往广东以满足订单需要,同时将广州滞销的漆器运至其他地区。江西商人在粤北地区的南雄、韶关、乐昌、仁化等地均建有会馆,很多客商也选择在广州定居开店。各地商人在粤北地区休憩之时,也会采购当地土特产进入流通领域,其中江西商人经营杂货包括外销漆器的一部分,大多由南昌和吉安商人进行贩运,在他们的努力经营下,这条商路成为各地漆器转运与外销当中的重要一环。

(三)以九江府为中心通达中原、北方地区

九江位于赣、皖、鄂三省及长江中下游之交,上通川楚,下达江浙,“素有‘三江门户’‘七省通衢’之称谓”^{[12] (P121)}。根据许檀整理的清代关税档案来看,顺治至乾隆时期,九江关的税额不断上升,到了道光二十一年已然成为内陆诸关之首^{[13] (P87-88)}。在甲午战争前的清王朝,九江都是江西商人进入湖北、安徽经营漆器的重要出发地:从九江府出发,经过姑塘、左蠡,再过都昌、饶州,走陆路到景德镇最后进入安徽徽州,或是由九江港沿长江东下直接到达安徽池州、安庆等地;若是沿江逆流往西,则可直达湖北武昌、黄州、兴国州等地。九江关的漆器及生漆交易数额庞大,如同治九年(1870),进关的漆家具、漆文具、漆骨扇等货值共约两千五百两,从汉口来的生漆货值约一千两^{[14] (P39-42)},基本都是各地关口的互通有无或互补不足。而同年自九江出口的漆盒、漆骨扇货值约一千四百两,小部分工艺精良的能出口外洋,多数则由大船运销于北方诸省,被京津和东北地区消化掉了。生漆出口货值约六千四百两,相当一部分远销朝、日和欧美诸国,由此可见九江是清代重要的生漆集散地,江西也是生漆供给大省。

江西商人以九江府为集散中心,用水陆交替的方式对江西境内的漆器进行转运,像吉安府的庐陵漆器,由产地装箱打包,填充谷渣、沙土或豆麦,骡马陆运过樟树、吴城,至昌江换小船水运至鄱阳,再换装大船入湖,由九江港或湖口入长江转销北方诸省和长江各口岸。除九江外,吴城与樟树,是漆器贩运北方的另外两大商业名镇,它们之间形成了密集的商业网路:“货之由广东来江者,至樟树而会集,由吴城而出口。”^{[15] (P6)}内销之货以樟树为中心,外销之货以吴城为圆点,北方诸省想要来自南方的漆器,可由江西商人在吴城转换大船出江贩运,经湖口、鄱阳湖逆江而上入湖北黄梅、鄂州抵达汉口,或过彭泽入徽州至安庆,最后抵达北方。

(四)以袁州府为中心渗透西南地区

袁州府毗邻江淮,襟带湘湖,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众多江西漆商前来牟利,萍乡县芦溪镇“商旅往来仝集”^{[16] (卷六《艺文》,P546)},清江镇也是“淮盐堆客肆,广货集商船”^{[17] (卷三, P565-566)},袁河水系紧密地将赣江与湘江联系起来,形成了江西与湖南、西南诸省的漆业贸易的内河航运网络体系。除水路外,陆路交通也是沟通袁河流域与湖南的重要通道,从清江县出发,历经新喻县、分宜县、宜春县、萍乡县,过插岭关至长沙府醴陵县,或从宜春县分支,走万载县到长沙府浏阳县^{[18] (《例言》, P25)}。嘉庆二十二年的湘潭县内约有六个

江西会馆,如庐陵商人会馆、临江商人会馆等专门经营漆业^[19](卷十九《祠墓》,P971),岳州、永顺、衡州、常德等府遍布江西商人足迹,无论是长途贩运的行商,还是长期经营的坐商,大多都是江西人。郴州府除了商人,许多江西籍的手工艺工匠也随商前来搏个饭碗,包括髹饰家具的漆匠等。

明清长江、珠江水运的进一步开通,使西南地区更加广泛深入地卷入商品经济的潮流之中,因此云、贵、川是江西漆商活动的又一重要地区。在贵州,作为商贾贸易咽喉之地的思南府,其所辖郡属遍布万寿宫^[20](卷三《寺观》,P77-83),其余如兴义府、松桃直隶厅等,都出现了大量江西商人的身影。云南在明万历年间就已有“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21](卷五《西南诸省》,P123)的现象,明末抚州学者艾南英也云:“吾乡富商大贾,皆在滇云。”^[22](P1098)不但在云、贵、川三省的大邑有许多固定经商的江西商人,偏远地区的苗寨也出现不少江西商人的身影,他们甚至一度垄断了许多行业^[23](P54-55),除了最大的典当业、矿业,也基本囊括了漆器和生漆的业务。

此外,袁江流域也盛产各种漆器原料如漆、苧麻、夏布等,不但自身品质上乘,也得益于商人的远贩传播:“漆,宜春稍多,贾人以达四方。”^[24](卷二《物产》,P26)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当地盛时有作坊近百家,生漆年产量可达五万担。同时,袁州府本土的脱胎漆器也兴盛于康熙年间,兼具工艺之美与文化内涵,漆工艺的兴盛与商人的经营相互呼应,使这些经济、工艺价值较高的实用器皿深受西南诸省市场的欢迎。

三、江西商人经营漆器的方式与特点

(一) 伴随大宗商品的零售

漆器在清代的内陆流通商品里并非大宗买卖,即便是在对英、荷、法等国的外销贸易中也是小额订单。江西商人受限于资本规模,只能在大宗商品中夹杂各类漆器的装箱贩运,这种零售形式无疑比较适合长途贩运的走商,能适应资金分散、小本经营的特点。以粤北与江西交易往来为例,商人先在墟市将商品集中起来,以布、米、茶、盐为大宗,过大庾岭、南雄,再运往韶州,最后继续南下至广州交单,从广州再采购大宗商品及少量漆器、铜器按原路返回,走赣江至吴城、广信进行转销。

在长途贩运时,漆器交易往往需要牙行组织来作为商品交换的中介。范文澜《中国通史》就曾提及牙人在商业中的作用:“牙人招揽买卖,协议物价,官府和商人交涉,有时也使牙人出面。”^[25](第三册,P150)清代南昌及吴城、景德镇的牙人组织甚为兴盛,明清一系列的世情小说中对于长途贩运与牙行之间相依相存的关系也描写得非常细腻:《醒世恒言》中,老仆阿寄就是靠着采漆之地牙行帮忙购漆发家致富的^[26](卷三五《徐老仆义愤成家》,P307-314),牙行在此处发挥了收购货物、安排发货的作用;而《鸳鸯针》中江西商人吴元理去南京兜售大宗米粮,牙行老板范顺提供准确行情、储存货物、估算货值,甚至代主出脱和收取货物^[27](第四卷第一回《欢喜冤家一场空热闹》,P164-173)。

阿寄贩漆的故事也从侧面反映了苏杭作为明清重要工商业中心,却没有大资本漆商屯集,导致漆供不应求,而江西商人在贩米的同时,顺道夹杂大量漆器与生漆,一定程度上能够保障商品的正常流通。当江西商人将生漆、夏布等漆原料运到溧阳、无锡、常州等地时,作为客商不能与零售商人打交道,需要寻找自己熟悉的牙行、牙商,与行家议定价格,然后将货发在栈中,由牙行向本地商人发售。同时,江西漆商也在外地以牙人身份做生意,根据销售额抽取行用。

(二) 双向店铺的定点往返

依托行会组织开设固定店铺进行漆器的销售,是江西商人经营漆业最为直接的方式。清代南昌府士商云集,行会林立,漆器什物铺是典型的手工业行会组织。除在本地开店经营之外,资本厚实的部分江西商人为争取稳定的营销渠道,也在其他府县开设商铺,如苏州、长沙、汉口、广州、贵阳等地,都有许多常设漆店。

在广州最繁华最热闹的濠畔街、卖麻街,江西的泰和、樟树、丰城、南康等地商人联合建立了江西会馆,濠畔街百货之肆林立,

商贾云集，卖麻街是手工业商品的旺地，有许多木器、漆器、竹器等小宗买卖，一定程度上可见江西商人在广州的活跃。泰和、樟树商号的江西商人把生漆运至广州以应付大量的外销订制漆器，完成英国人的订单之余把剩余漆筒、漆扇等货按原路运回至内陆贩卖，所有的程序严格按照行业制度，双向经营多年并保持了相当的口碑。清代漆家具上使用最广泛的木材和涂料也经常出现在相关的记录当中，如《江西通志》中载“广漆苏木每百觔一钱四分”^{[7](卷三四, P173)}，这个税价相对于当时广漆大约每斤五分五厘的价格而言是非常低的，这也是江西商人能安心客商广东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便是到了清后期基本没有大宗商品流通过关，从赣州的关税记录中也可以看到定期往返的商人们带来的漆器品类与税价，可见这条定点往返的漆器贸易路线十分稳定。

汉口作为清代的商贸重镇，也是吸引江西漆商开设支店的重要区域，山陕商人将陕西盛产的生漆运至汉口，由当地开店的江西商人统一收购，顺带把福建转运来的漆器兜售至北方商人手中，一直到民国时期江西商人在汉口的麻、漆、药业方面的操持都是翘楚。如汉口简启祥漆号，是江西高安简姓商人开设的百年老店，专门操持生漆与漆器生意，由鄂西南恩施、咸丰、宣恩等地收购茅坝生漆，自己加工、销售、批发兼带零售，远销江淮与四川。

(三) 配合造办处的采买与御贡

清代不设专门官吏负责采买漆器，全部由各地政府和设外机构代办。一般由内务府向某个地方官府下一道谕旨，列出所需物品名称，然后由主管官员负责向当地漆商购买或定做。除地方政府外，织造衙门、海关、盐政等部门也时常为宫廷办理采买业务。但招募商人进行采买往往更加便利，如江西商人就经常自备资本采买漆器，再由历任都陶官按时价收购，以御贡内廷。

景德镇的浮梁瓷局作为清廷管理全国瓷器、漆器的仓库，与内务府、造办处也有着紧密的关联。瓷器、漆器及原材料入库后，由朝廷根据需求，通过水路或陆路运走，分配给各地官府或军队使用。剩余的产品以及工部、匠作院要求烧制的其他贸易产品，都可以在估价后安排指定商人进行统销。此外，景德镇的特殊地位，也刺激了清代漆器、瓷器工艺上的跨界结合。朱家溆研究认为，雍正朝流行的黑漆描金彩画瓷碗，类似当时流行的珐琅彩瓷器，江西烧造的薄胎白瓷碗，正利于退光漆画做法，深受皇帝喜爱。^{[28](P9)}

地方官与江西商人的组织采买，使地方制作的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漆器得以以进贡的形式进入宫廷，一定程度上既丰富了清廷漆器收藏品类，又有利于促进漆器工艺的发展和提高。如江西制作的波罗漆器就是其中颇具地域特色又有精湛工艺的贡品，康熙六十一岁寿诞，江西巡抚佟国勳就曾托商人采办波罗漆以御贡祝寿，用以制作砚盒、笔筒、花瓶、扇柄等小品漆器。造办处档案也记载：雍正七年（1729），“太监张玉柱交来波罗漆都盛盘四件，系年希尧进，着送至圆明园”^{[29](第三册, P675)}；乾隆十八年，“九江关监督唐英进贡波罗漆圆桌成对”^{[29](第十九册, P412)}。描金和洋漆的漆器是宫廷流行的日常用器，年希尧的家人郑天锡往来京城、景德镇之间呈送瓷器、漆器成品和式样，供皇帝挑选。雍正五年，雍正着传“江西烧造瓷器处，将无釉好款式的瓷碗烧些来，以便退光漆做”^{[29](第一册, P453)}；雍正九年，皇帝使人“将无釉白瓷碗上做洋漆，半边画寸龙或画梅、或竹、或山水”^{[29](第四册, P712)}。

四、结语

清代漆器生产规模得以扩大并改变生产方式，同时工艺上又不断推陈出新，是与其时全国商品市场的形成息息相关的。在区域性生产地和众多集散重镇共同罗织的商品经济网络中，江西市镇的地理优势以及江西商人的贩运手段和经营方式，决定了江西商人成为这一时期国内的主要漆商，他们或为漆器重要产地补充生产原料，或为外销漆器的加工提供成品，或将精致的漆器带往工艺相对落后的地区，或将本土特色漆器推向统治阶级，在漆产品的富余和不足中协调平衡。对于以贸易手段实现漆文化的传承和外溢而言，江西商人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各地独具魅力的漆艺文化在江西商人的贩销过程中得到传播，使得漆器工艺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完成了一次颇具规模的、集大成式的交融。

参考文献：

[1] 李久芳. 清代漆器[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
- [2]方志远. 明清江右商帮[M]. 香港:香港中华书局, 1995.
- [3](明)徐世溥. 榆溪集选[Z]. 顺治十七年(1660)陈允衡肥静斋刻本.
- [4](乾隆)广信府志[M]. 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919 号).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89.
- [5]范金民. 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6]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
- [7]江西通志[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17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8]许檀. 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8, (3).
- [9](明)笕继良. 铅书[M].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 北京:国家图书出版社, 2013.
- [10](德)利奇温. 18 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M]. 朱杰勤,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2.
- [11](法)杜赫德.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M]. 郑德弟, 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1.
- [12]陈晓鸣. 从常关到海关:九江在长江流域贸易地位的变迁[J]. 江西社会科学, 2018, (12).
- [13]许檀. 清代前期的九江关及其商品流通[J]. 历史档案, 1999, 1, (1).
- [14]刘生文. 近代九江海关及其商品流通(1861-1911)[D]. 南昌:南昌大学, 2005.
- [15](清)傅春官. 江西商务情形说略[J]. 江西官报, 1906, (27).
- [16](同治)萍乡县志[M]. 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270 号).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6.
- [17]梧冈集[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42 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8](清)顾长龄. 江西全省舆图[M].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6.
- [19]湘潭县志[Z]. 嘉庆二十三年(1818)刻本.
- [20](道光)思南府续志[M]. 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四十六册). 成都:巴蜀书社, 2006.
- [21](明)王士性. 广志绎[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 [22](明)艾南英. 天佣子集[M]. 台北:艺文印书馆, 1980.
- [23]方志远. 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江右商[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3, (4).

[24] (同治)袁州府志[M]. 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845 号).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89.

[25] 范文澜. 中国通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26] (明)冯梦龙. 醒世恒言[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9.

[27] (明)华阳散人. 鸳鸯针[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5.

[28] 朱家溍. 清代漆器概述[J]. 文物, 1994, (2).

[29]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